

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的中国本土化： 探索、反思与进路

陈 梁 汤鸿杰 刘斯佳

摘要：当前，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尤为迫切。随着全球健康、环境和风险议题的不断凸显，本土传播学者纷纷关注并开展相关研究。在我国，由于这些议题的全球性特征，且相关学者多具备海外教育背景，这些领域逐渐成为传播学研究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方向之一。通过对健康、环境和风险传播研究历史的梳理以及对传播学“本土化”的概念进行辨析，研究认为，实现我国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本土化的核心在于立足国家文化和社会语境，关注议题的共性和个性，采纳综合性研究方法与跨学科视角，可在理论验证、理论拓展及理论创新等三个步骤上充分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值得强调的是，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并非仅服务于中国学术话语和问题解决，更是为全球共同面临的健康、环境与风险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出具有跨文化普适性和引领性的理论体系。本土化不仅是一种知识生产的路径选择，更是推动中国传播学科理论范式自我确立的关键契机。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的研究经验表明，唯有立足中国的文化语境、社会结构与制度逻辑，才能建构起具有主体性的问题意识和概念体系，从而真正进入全球理论对话的核心。

关键词：健康传播；环境传播；风险传播；本土化；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5)03-0015-13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文科自主科研项目

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经过几十年的学术积淀，已成为当前传播学中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他们以相似的问题背景、共通的方法、互鉴的理论得到学者广泛关注和探讨。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将这些领域结合建立了科学、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分会(Communicating Science, Health, Environment and Risk, ComSHER)，为当前的健康、环境与风险问题提供传播学视角的启示。值得强调的是，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实证主义导向，既重视理论的基础，也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和实践启示。同时，这些研究领域广泛与公共卫生、公共管理、环境科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等进行跨学科融合，不仅为解决健康、环境和风险问题提供传播学的策略与方案，而且可以提升传播学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影响力和能见度，凸显传播学在科学界的重要角色，也使得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投身于相关领域。然而，发源西方的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在引入我国的进程中难免有些“水土不服”，大批海归学者在本土从事相关研究时被认为缺乏本土意识，单纯依附于西方范式和理论来分析本土经验。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在此学术浪潮中是否秉持了开放包容、互通互鉴的理念？是否关切我国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的具体问题？基于此，探索与反思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在我国本土化进程不仅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而且可为我国传播学者未来开展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明晰方向。同

时辨析相关研究领域中的本土化意识也将有助于我国学者依据具体国情和社会语境从传播学视角解决健康、环境、风险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最后,借助对以上研究领域本土化意涵的解构和重构,有利于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及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探索和思考。

一、“本土化”概念与传播学的本土化意识

所谓本土化(Localization),指的是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或产品,根据国情进行改进或改造,使之适应本国的需要。因此,据其词义可以了解到,本土化以国外的先进成果作为前提,进而按照本国的发展需求与实际情况进行修订与拓展。从整个社会科学的视阈来看,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与否的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学界的广泛热议。与传播学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社会学学者们在此之前将其讨论推向新的高度。有学者强调,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而正是这种探讨和号召使许多研究者陷入误区——从研究议题来看,针对中国特殊问题的相关研究已相对饱和;而从应用的角度,亦未能将西方理论、方法与本土特色有机结合,在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理解上欠缺深度与精准度;从研究范式上过分倒戈本土的研究路径,回避国际上一贯的经验范式。但是,我国学术知识生产与评价体系需要比肩国际,应该具备超越他国的学术自信。^[1]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本质逻辑是建设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本土化不该是个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应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目标,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借鉴古今中外一切理论与方法,再回到中国经验与实践中去检验。”^[2]因此,有学者认为从追求学术自主性出发,本土化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然而,本土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杂糅了古今中外各种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合力,学术本土化到底是中国学术涅槃的一次契机,还是仅仅是由经济繁荣刺激出来的乌托邦幻象,仍然存在不确定性。^[3]

回归到本文对于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回望与反思,传播学这一学科领域在我国发展的40年间,针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探讨可谓百家争鸣。刘海龙将研究本土化之争纳入知识社会学的框架,从话语层面梳理了本土化探讨中“理论与应用”“普遍与特殊”的两组张力,并认为基于以上不同维度得以构建4条各有侧重的本土化路径,而只有真正实现多元本土化路径的综合发展,我国传播学研究才能走上正确的本土化道路^[4]。亦有学者对所谓“西方”和“中国”的二元对立框架作出批判,指出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应该是与西方研究对话时的批判意识,这种学术自觉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学术话语地位,但需强调这种自觉意识不应以二元对立为目的,而是应当建立在理论与经验的融合和沟通之上^[5]。相似地,李智认为,本土化在于“化”而不是“本土”,中国传播研究应摒弃二元对立,形成世界理论——中国经验——中国理论——世界经验——世界理论的闭环,既保持相对独立,又形成与世界学术研究的互通有无^[6]。邹利斌和孙江波则认为,立足本土研究要将中国经验、中国问题、中国范式的三者结合,其中中国范式的建立与发展是最高层次,但同时也是最艰巨的^[7]。当前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范式是否已经建立了科学标准与成熟体系,学界暂无定论,但两位学者仍强调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应将传播理论的本土贡献作为首要目标。

在关注个体认知、态度与行为的研究导向下,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中受众与效果相关研究占据了半壁江山。因此,也有学者针对我国受众研究的本土化路径进行了思考,祝建华认为,既要注重本土化,但同时也要推动中国研究问题的理论化,由此生成的科学理论才能帮助进一步实现本土化^[8]。聚焦危机传播领域,有学者以国外研究为参照,认为政府与组织危机传播研究中的“西方范式”可以为我国提供概念、理论及范式上的指引^[9]。因此,王怡红早就呼吁本土化的倡导是为了达成中西之间的平等对话,实现人类共同的学术追求,让本土化号召的“空谷”不要只是虚假的回声^[10]。

二、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的研究起点与流变

(一) 研究起点与历史溯源

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这三个领域的起点与发展都受到了特定的社会环境与研究范式的影响。这三个领域萌发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关注受众与效果研究,聚焦于人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机制,经过几十年间的积淀与发展,现已成为相对成熟的学科领域。

1. 健康传播

20 世纪 70 年代,Korsch 和 Negrete 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发表文章,从医患沟通的角度探讨健康传播对于医学的影响,为健康传播的开创奠定了基础。^[11]1972 年,国际传播学会“治疗传播兴趣小组(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并于三年后正式更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此后,涌现出大量开拓性的健康传播研究,众多学者对如何促进健康信息的传播过程、提升受众健康行为的采纳,开展了一系列深入探索。

2. 环境传播

同样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寂静的春天”“环境正义”等环境保育运动的背景下,日益加剧的环境问题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催生了学界对环境传播领域的探讨^[12]。Schoenfeld 1972 年发表的《环境传播的兴起》一文使“环境传播”一词首次出现于公众的视野。同年,Stamm 在《大众传播研究前沿视角》中提出“环境与传播(environment and communication)”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迅速引起广泛关注,“旨在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关环境议题表达的传播实践与方式”^[13]。1996 年,美国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成立了环境传播研究委员会与环境传播分会,标志着环境传播逐渐发展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领域。

3. 风险传播

与此同时,风险传播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社会公众对健康、环境问题和科学的担忧之中。通过其实践导向,致力于帮助公众准确认识、评估并妥善应对风险。早期风险传播研究关注描述和分析风险,以及教育公众关于风险防护的知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逐渐转向对公众风险认知的深入探索。目前国际上对风险传播极具影响力的定义为个人、组织和机构之间与风险评估、风险描述和风险管理相关的信息交流活动^[14],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准确地了解风险和为管理风险作出决策而进行的对话^[15]。

总体而言,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这三个领域均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方社会中应运而生,其诞生背景源于社会对相关健康、环境和科学议题的广泛关注与深切担忧。这些领域致力于通过信息传播实践,提升公众对相关议题的认知度,引导公众态度的转变,并进一步推动公众在相关议题上做出更为明智的行为决策。

(二) 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的传统研究范式

从研究范式的视角来看,传统的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领域以实证主义范式进行的经验性研究占绝大多数,另有少数的批判性研究。健康传播的研究路径根植于后实证主义与社会心理学,旨在基于建构变量探讨信息和认知、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16],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健康的干预措施。健康传播研究主要源自行为及社会科学、大众传媒、营销学、医学、社会学及人类学,因此也深受上述学科的实证主义影响^[17]。环境传播研究则在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使命的引领下,最终在实用主义维度上形成了学术对话。例如,Guillierie 等为了保护与改善环境,环境传播者应通过个体或群体行动帮助人们提高环境意识与了解自身的环境责任^[18]。而风险传播领域的重要学者,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Kahneman、其学生 Fischhoff 及其同事 Slovic,都受到过多年系统的心理学学术训练,并将这种

训练基础应用到了风险传播的研究与分析之中。因此,在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的学科发展中,实证主义与经验研究成了这三个领域的主流研究范式。

(三) 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的研究差异与交汇

从研究议题的合流来看,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的发展历史使其在研究议题上呈现出跨学科、多学科融合的特点。由于健康传播和环境传播都涉及大量风险信息的获取与处理,使得这三个领域彼此在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等议题上相互重叠。同时,由于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参与,也使得这三个领域各自的研究议题丰富多样。例如健康传播主要研究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等议题,从人类传播视角出发的学者关注人们对特定健康信息的态度、信念和行为,而从人际传播视角出发的研究者更加关注人际关系对健康态度、信念与行为的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和健康宣导成了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进入21世纪,大多数的研究开始聚焦健康信息的内容与传播效果上。而环境传播在过去的十年中,学者们已经将研究重点从一般的环境风险转移到更加具体的议题,例如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而风险传播研究除了前文提到的健康、环境风险之外,还会关注新技术应用风险(如数据泄露)或社会性风险(如战争和恐怖袭击)。

从理论的应用与发展来看,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领域的理论大都起源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并在之后跨学科的研究中不断发展衍生出自身的理论体系。健康传播中最常被研究者运用的理论是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和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此外还包括社会规范理论(Social Norm Theory)、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拓展平行反应模型(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和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19]。而环境传播,主体上是围绕环境议题基于经典传播理论进行研究,包括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20]。风险传播最初关注公众如何准确认识高风险情况,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理论转型,很快将研究重点转向测量和评估公众的风险感知上面。迄今为止,风险传播的大部分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研究视角:危害的特征、风险感知者的特征以及风险判断的启发式模型^[21],经常运用的理论包括风险信息获取与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Model)、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情感启发式模型(Affect Heuristic Model)和心智模型(Mental Model)^[22-25]。

经过50多年的沉淀和发展,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已成为相对成熟的学科领域,三个领域呈现出研究对象的高度重叠、研究视角的紧密联系以及研究理论的交叉运用。

三、中国本土化探索: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

已有学者对于20世纪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中国本土的传播学研究融入世界学术海洋是必然的方向^[26]。然而20年过去,随着世界的日趋全球化以及我国国际地位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我国的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是否与国家发展同步同调,在国际研究舞台大放异彩?虽然有研究指出,从新闻传播学整体的国际发表情况来看,本土化意识的树立并不符合期待^[27]。但从健康、环境以及风险传播研究的视域来看,涌现了一批华人学者不断推动中国问题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因此,笔者将从中国文化、社会问题研究以及中国经验与经典西方理论的互动等方面梳理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领域的本土化探索。

(一) 文化现象的本土化探索

1. 历史文化与健康:器官捐赠

器官捐赠短缺问题一直在国际社会备受热议,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器官捐赠注册率却不尽人意。这样的情况导致了成千上万本有机会生还的患者由于无法找到适配的器官而遭

憾离世。从中国的丧葬文化来看,个人及其家庭都希望保持逝者离世时躯体的完整性,这主要是由于儒家思想背景之下“孝道”在中国极其重要。《孝经》谈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下,器官捐赠包含了强烈的历史文化色彩。个体对器官捐赠行为的态度决定了其是否会自愿进行器官捐赠注册,因此在如此特殊的文化语境下,Shi 基于经典的理性行为模型(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将理论中的态度(attitude)维度予以拓展^[28]。她认为在中国的器官捐赠问题应包含认知态度(cognitive attitude)以及情感态度(affective attitude)两个层面,并且在其不同层面内也同时包括正面和负面两种方向。其研究最后也证实了其假设,即人们正面的认知态度或情感态度及负面的认知态度或情感态度都能显著预测人们的器官捐赠意愿。此研究根植于我国特殊的文化语境,对我国进一步推广公益善举以及器官捐赠沟通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证据及建议。

2. 思想文化与健康和环境问题:宿命论、中庸

受到儒家及道家等传统东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健康、风险和环境相关信息的传播机制和效果也会受到这种思想文化的潜在影响。儒家典经中的“中庸”思想就已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中庸思想饱含待人接物时持“中正平和”的态度,是一种对“恒常和谐”状态的追求。有学者认为中庸思想天然蕴含了“天人合一”的哲理,作为一种认知和思维定式会影响人们对于信息的处理和反应。在他们的环境传播研究中,他们发现中国居民的中庸思想程度影响了他们对环境保护相关信息的关注(官方及社交媒体)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强度。中庸思想增强了社交媒体环境信息关注对于亲环境行为的正向影响,但却削弱了官方媒体环境信息关注对亲环境行为的效果^[29]。

类似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命由天定”的宿命思想。在宿命论者之中,当面临突发的健康问题时,他们往往显得较为消极被动。因此,宿命论思想(fatalism)对于个体生命安全的保障和健康促进无疑是极大的阻碍。有学者基于新冠疫情的背景,对中国年轻人的社交媒体使用、宿命论以及焦虑情绪进行了研究^[30],发现宿命论思想在媒体接触与焦虑情绪之间扮演了完全的中介角色。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宿命论会带来年轻人在疫情期间的压力和焦虑,但社交媒体的使用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他们认为自己对自身生命健康无能为力的思想。因此,从健康传播的视角,此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一定程度上能转变文化观念。

3. 社会家庭文化与健康:乡镇人情问诊与家庭生育沟通

同时,社会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具有“人情社会”的特征与属性。从信息共享的层面来看,特别是针对稀缺、珍贵、私密的信息时,“关系”或“人情”这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Chib 等在中国数字与信息通讯技术(ICTs)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探索了中国人的“人情关系”对农村医疗体系中健康信息交换的影响^[31]。此研究对陕西省某村落的乡村医生、患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访谈结果显示,乡土人情关系有利于同村及附近村落医生的信息交换,进而提升了乡村医生的专业知识和诊疗水平。其中,移动手机在他们同辈关系维持和专业信息交换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通讯技术还帮助实现村民与当地医生的看病、拿药及手术预约事宜,构建或加强医患之间的人情关系,进一步提高诊疗效率及医患之间的黏性。

笔者也注意到,在中国社会另一种特殊的人情关系便是“婆媳关系”。在中国,婆媳关系的处理常常与婚姻生育问题相关联。如中国传统且特殊的产褥期保养行为“坐月子”、新生儿的哺育与照看方式、产妇身份转换等也逐渐成为我国“新手妈妈”产后抑郁的潜在诱因。因此,有学者对于中国生育问题中首次生育的女性展开产后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的调查。他们认为与具有血缘关系以及多年情感联系的亲生母亲相比,新手妈妈对自己的婆婆会出于维护和谐的家庭关系展示孝道中的服从、尊重等,因此,婆婆所提供的产后支持会让媳妇从认知上觉得“看似帮助,实则负担”。其研究结果发现,亲生母亲的产后支持确实减轻了新手妈妈们的焦虑情绪,而婆婆的支持对于产妇情绪的影

响效果并不显著,研究者认为婆婆所提供的产后支持与婆媳之间的关系张力相互抵消^[32]。因此,在健康传播的社会支持沟通方面,我国学者也应更多地考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及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

4. 爱国主义文化与风险:公共卫生疫苗注射

另一方面,生活在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公民的爱国情怀在如新冠疫情这样突发的公共健康危机事件中屡屡得以展现。从2019年末新冠疫情暴发,中国人民见证了武汉及全国其他省份转危为安,见证了政府的有力抗疫举措及人民在抗疫行动中的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因此,学者们考察了爱国主义文化与民族自豪感在防疫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33],发现在防疫常态化阶段人们的爱国情怀对于个体的防疫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国家自豪感越高的人越会坚持防疫措施。与此同时,从阴谋论与公民的防疫服从角度,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发现,高涨的爱国热情促使人民坚决服从防疫安排,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二) 社会问题的本土化探索

除了上述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以外,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在健康、环境以及风险等领域也存在着诸多社会问题。

1. 健康传播:医患沟通问题

一个问题是医患矛盾。不管是之前榆林产妇事件还是眼科医生陶勇被刺,此类医闹事件都折射出我国医患之间尖锐的关系矛盾和张力。有研究指出,从患者在线下与医生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到线上就诊看病的转化过程应考虑到患者对于医生的信任(patient trust)以及对于诊疗的满意度(patient satisfaction),二者对于线上线下就诊之间的关系都有明显的正面推动作用^[34]。Chen等人则从中国医务工作者视角提供相关经验支持,他们发现医生自我报告的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行为通过建立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任,从而有利于减少医患冲突^[35]。Zhong等人更是将我国医疗体系结构放置到医患关系的讨论之中,兼顾个人、医院以及我国医疗体系层面考察了医患纠纷与遵医嘱行为^[36]。研究者发现,与医疗工作者发生纠纷所导致的糟糕体验会降低人们对于医生本人、医院以及社会医疗系统的满意度,而这样的不信任感和负面印象又会导致患者不遵从医嘱,影响治疗效果。而可以预见的是,此情况下患者最终也会产生医疗不信任感,如此循环往复,最终落入恶性循环。

2. 环境传播:垃圾分类动员

另外一个当前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则是环境责任的分属——如垃圾分类。根据中国人以往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人们生活垃圾的丢弃往往是随心所欲,没有规定和准则。虽然早有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的多元分类方法和倡议,但公民意识和其推行效果并不乐观。而对于居民生活垃圾的处理,此前基本属于其住所保洁员及垃圾站的一站式服务。因此,近几年我国公民的垃圾分类行为主要依靠行政规制和道德约束,人们的主体意愿不强,甚至出现了抗争等现象。有研究从信息设计与公民宣教的角度出发,基于经典的收益-损失框架与个人-社会框架理论,并将人们的未来考虑倾向纳入研究框架,通过实验得出了推动我国公民进行垃圾分类的具体信息策略^[37]。研究发现,相比于垃圾分类对全社会的益处,当人们阅读叙述垃圾分类对个体自身好处的信息时更愿意进行垃圾分类,并且更加重视未来及长远打算的人群也更会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

3. 风险传播:病毒传染与食品安全风险

艾滋病由于其较低的治愈率和极高的传染性和致死率一直是全人类长期关注和探讨的健康疾病。在中国,患有艾滋病的男性被高度污名化,饱受病痛折磨及社会排斥的双重压力,在夹缝中求生的他们开始在网上寻求社会支持。有学者针对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中男同性恋艾滋病患者所发布的微博进行了内容分析^[38],通过对此群体在微博平台所发布的社会支持寻求及供给信息进行分类,发

现其社会支持信息主要包括情感支持、信息支持、物质支持、人脉支持以及自尊支持(如赞美、肯定等)几种主要类型。同时,从他们在微博上的自我披露程度来看,那些表露出对于同性恋群体被污名和被歧视现象较为关心和担忧的用户倾向于发布更多的情感、信息以及自尊支持类的微博。

从苏丹红、三聚氰胺到地沟油、瘦肉精等食品安全问题一直都是我国民众生活质量及社会发展所关注的重点。在中国,“民以食为天”,食物的品质保障与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国家发展息息相关。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食品安全问题频频成为公共舆论事件并在社交媒体场域发酵。因此,有学者聚焦中国的社交媒体舆论场以及用户的信息处理模式,探究了社交媒体接触度及可信度对于人们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效果^[39]。其研究结果表明,人对于社交媒体中食品信息的接触以及对于社交媒体的信任度会激发他们对于信息的系统化处理(即详尽、仔细地评估、考察和接受),而基于这样的信息处理方式,人们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会得以提升。基于此,研究指出在食品安全问题中社交媒体作为信源对于个体的风险感知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及利益相关方应把握社交媒体中的舆论引导并对信息质量的把关,从媒介效果出发改善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问题。

(三)本土经验与经典理论的有机互动

正如前文所述,本土化的关键步骤是搭建经典理论与中国经验的有机互动。基于大量研究,经典理论的解释力在东方语境中得以考察和验证。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更是基于中国经验的特征和属性,发展及延伸了以往的理论及模型。

Witte 所提出的拓展平行反应模型(the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EPPM)被广泛运用于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领域^[40]。作为将信息属性、接收者认知及情绪过程、信息接收反应进行综合论述的理论模型,拓展平行反应模型被认为是当前恐惧诉求研究中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之一^[17]。Chen 等在控烟研究中发现,传统的拓展平行反应模型(EPPM)以强调威胁和效能来说服公众参与健康行为,但是不同于西方,香烟在中国民间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礼品,因此公众很难接受香烟盒上标识过分刺激或恐怖的警示图片(如溃烂的器官),这意味着使用拓展平行反应模型研究中国戒烟情境时需要进行拓展和修正。与此同时,相比于西方社会,中国作为集体主义社会,公众除了关注自身以外,也特别关注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因此,研究在原始的拓展平行反应模型基础上加入他人导向的威胁(other-oriented threat)信息,这类信息不但能够较好地呈现在香烟盒上,也能更有效地促进中国烟民戒烟^[41]。也有研究将拓展平行反应模型放入乳腺癌疾病宣导的语境中,发现提示乳腺癌严重威胁及告知乳房自查有效性与可行性的信息对我国女性的乳腺癌筛查意愿都有显著影响。特别是针对恐惧诉求信息的呈现媒介,其研究得出了重要且富有贡献的实践及理论意义,即恐惧诉求信息无论是呈现在传统纸质的宣广材料还是社交新媒体平台,其对于推动女性进行乳房自检的媒介效果并无明显差异^[42],此实证证据进一步拓展了 EPPM 的理论适用范围,并对于我国的社交媒体健康宣教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指导。

议程设置理论(Agenda Setting Theory)作为媒介效果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其描述了媒体所呈现内容与受众议程关注之间的相关关系^[43]。以“教堂山研究”为起点,议程设置理论从第一层发展到第三层网络议程设置,在其走过的 50 年风雨里,其理论层次与含义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区别于西方的媒体制度,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的跨文化理论适用性一直备受关注^[44]。因此,有学者结合新冠疫情,针对野生动物保护议题在社交媒体微博中的议程设置效果进行考察。根据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二层属性议程设置及第三层网络议程设置,他们发现针对新冠疫情期间社交媒体上对于野生动物的讨论中,在其议题的某些属性以及属性网络上并不是传统单向的议程设置关系(如媒体对公众进行设置),而是动态、双向互动的设置关系(媒体对公众与公众对媒体)^[45]。因此,议程设置理论第二层及第三层的理论含义在中国的社交媒体舆论场与环境相关议题下得以拓展。在本土经验与经典理论

的有机互动之下,无论是对理论语境的丰富抑或是理论内涵的发展,都充分展现了中国经验的重要研究价值。

从风险传播的视角,有研究关注中国样本中个体对于风险事件的认知和信念程度对于风险信息搜寻的影响。风险信息搜索与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Model,RISP)建构认知、态度及规范信念等因素对于个体搜索和处理风险相关信息行为的联系^[46]。在一项跨国比较研究中,他们发现相比于美国样本,中国受访者对于风险信息的搜索意愿更不易受到上述因素(如态度、认知、情感和信念等)的影响^[47]。换句话说,其理论模型的具体解释力度依然受到不同文化语境的制约,而中国经验也为其经典理论模型的再检验和拓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表 1 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在文化、问题及理论本土化维度的探索

	文化本土性	问题本土性	理论本土性
健康传播	孝道文化(Shi,2019) 宿命论(Ngien & Jiang,2022)	医患矛盾(Chen,et al.,2022; Jiang,2020;Zhong,et al.,2019) 产后婆媳沟通(An & Chou,2016) 乡镇人情与问诊(Chib,et al.,2013)	拓展平行反应模型:个体与他人 群体导向(Chen & Chen,2021); 恐惧诉求信息媒介传播效果差异 (Chen & Yang,2019)
环境传播	中庸思想(Zhang & Li,2023)	垃圾分类(Sun,et al.,2021)	议程设置理论:双向动态议程设 置(Wang,et al.,2023)
风险传播	爱国主义文化 (Jia & Luo,2023)	食品安全(Yang,et al.,2016) HIV 感染与社会支持 (Shi & Chen,2014)	风险信息搜索与处理模型:认知、 态度与信念对于信息搜寻影响的 跨文化差异(Yang,et al.,2014)

四、思考与进路: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方向

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开始关注与探讨中国传播学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特色以及中国社会科学“西方化危机”,部分学者批判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领域的本土化问题,认为从事这些领域的研究大多数缺乏对本土化的思考,特别是在研究范式与理论应用上缺乏一套适应中国情境的体系。有研究也发现,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本土化的尴尬境遇突出表现在对于理论的把握缺乏深度,难以兼顾本土化问题探究和理论国际化之间的有机互动^[48]。诚然,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渊源乃至认知体系都具有其独特性,因此将西方传播学概念、理论应用于中国本土的研究须从多重面向考虑其与中国社会语境的适配性。同时,从研究议题选择角度来看,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的本土化要注重实现共性和特性的结合,在方法运用及研究视角要打破桎梏,不拘泥于先前研究的传统。

(一)本土议题与全球发展趋势

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本身具有其议题特殊性。西方此领域相关的实证研究往往受到研究基金提供方的制约,需要提供相关的科学经验,服务于特殊问题的解决。因此,议题选择自主权较为薄弱。而我国从事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的相关学者不应只是机械效仿和跟从,在议题选择方面既要符合全球发展趋势,又须服务于我国的发展战略。如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健康养老以及相关的家庭沟通模式需得到重视和深入探讨;同时,遵循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倡议,我国由于其广袤的国土和差异化的地貌和地质条件,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显示其多样性。因此,在环境传播本土研究时,可推进环境问题的不同面向,获得差异化的沟通和传播经验。除此之外,全球智

能科技发展浪潮促使我国进一步构建“智能向善”的和谐社会。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传播策略帮助我国公民应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尤为重要。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也进一步强调推动“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人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9] 总结而言,实现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既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与关切,也是对研究者议题综合性选择的考验。

(二) 综合性研究方法 with 跨学科视角

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由于其经验导向和应用属性,更加关注传播效果的研究。因此,该领域早期的研究往往侧重量化分析而忽视质化研究,强调推断而相对轻视描述。然而,要推动这一研究在我国本土化发展,不仅需要遵循科学的研究范式,还应灵活综合地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以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实证研究。例如,在探讨我国健康、环境及风险相关的特殊传播问题或特定人群时,应充分回顾现有研究成果,并根据研究空白与具体问题选择适配的方法,而非机械套用西方范式。对于我国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或新近兴起的相关议题,研究初期可借助质性研究工具积累探索性发现,随后在研究中后期采用质化量化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分析。此外,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作为新闻传播学的“进出口港口”,自然成了跨学科研究的交汇点。在推动本土化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避免闭门造车,积极借鉴公共卫生、环境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经验,以拓宽理论视野和提升研究的实践价值。

(三) 西方经典理论应用与本土理论意识

事实上,许多从事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本土化的重要性。他们关注中国议题,并且运用西方理论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但是,其所做的研究到底能否被称为本土化研究呢?笔者认为,这至少是本土化第一个阶段中应该开展的工作,是实现本土化的必经之路。换言之,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构建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落脚点必定需要实现从经验发现到理论体系的迁移,因此,理论本土化无疑是重中之重。

1. 理论验证:把握理论意涵及本土化应用

在此阶段,学者关注中国议题并尝试使用中国的经验数据来验证西方的理论,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对此类研究表示质疑的学者便会认为,这些研究照搬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这些西方主流的研究体系必定不适宜中国本土的问题。但是,有学者指出这种主张是不负责任的,缺乏对于批判对象本质的理解^[1]。追求学术的原创性与生命力,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或刻意强调与西方的区别。数学公式和物理原理虽源于西方科学,但其科学性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验证。同理,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强调不同国家因文化、政治、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具有独特社会问题,不能机械照搬他国理论。然而,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在许多方面相似,尤其在健康、环境、风险等议题上,差异往往体现在程度而非类型。因此,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需摒弃固化否定思维,以开放且审慎的态度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在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领域,许多理论具有跨文化普适性,如态度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在不同情境下均能解释公众的态度、行为和观点。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的一些理论在中国特殊情境下可能不一定完全适用。例如上述 Shi 在器官捐献的研究中发现,认知态度(cognitive attitude)不一定能够有效地预测器官捐献行为,在中国语境中还应考察情感态度(affective attitude)^[28]。但如何发现这些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延伸空间和价值,则其第一步仍需要将经典理论与中国样本和议题结合从而去验证、考察理论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在中国情境中的研究问题。这不仅仅是学理上的第一步,更是对学者研究素养的考察。换言之,理论本土化应建立在对事物的全面认识的基础之上,实现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的

本土化,其核心要义不在批判,而是充分学习和把握。

2. 理论拓展:以中国经验增量全球知识体系

在充分地掌握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本土化的第二个阶段应该是对植根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进行拓展,使其能够适应中国情境,解决本土的研究问题,同时又能丰富既有知识的维度和深度,向国际学界作出贡献。固然,从全球知识体系来看,中国本土传播学也仍是世界传播学的一部分。而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领域所关注的议题,无论是新冠疫情、癌症疾病还是气候变化、空气污染等,这些无一不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探索,对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这从学理层面也推动着理论更广阔的适用性。例如前述研究在考察器官捐献的影响因素时,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了拓展,提出相比认知态度,中国人的情感态度,即情感上对器官捐献的认识和评估,更能影响人们的行为^[28]。有研究认为,中国人在环境问题决策中会考虑更多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50],即政府和社会对环境治理所做的努力,这些具体的研究发现,新的维度和变量更好地解释了中国的情境。但值得警惕的是,其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在理论模型中增加一些变量或者替换变量就足以实现理论上的拓展(部分传播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常陷入的一种迷思)。想要真正实现理论和方法在本土化上的拓展,就必须对文化传统、政治体制乃至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更深刻的思考和观察,充分考虑理论和方法在解决中国的健康、环境和风险传播问题和现象时所存在的不足,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层面的修正和拓展。

诚然,一个学科领域的知识浩如烟海,学人的个体贡献是微小的,增量上的,甚至是琐碎、趋近式的。但这些努力能让知识体系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不仅有助于知识的体量积累,也是实现研究本土化的重要一步。

3. 理论创新:善用本土征貌革新理论架构

学者指出,在充分掌握理论并且能够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理论验证和拓展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出扎根于中国的传播问题^[8]。如果因学术自信不足而未能参与国际传播学对话,或未在国际学术共识的基础上采用严谨范式以获得认可,反而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批判西方理论、强调本土化,便会混淆传播学本土化的核心问题,导致本末倒置。事实上,在中国语境下检验西方理论,正是理论创新的契机。

一方面,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家庭观念及媒体环境为理论的跨文化普适性验证与拓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智能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也为媒介变迁中的理论创新带来机遇。例如,中西医并存的医疗体系仍缺乏精准的理论框架来解析其影响民众健康信念与行为的机制;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数字革命,也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工具来研究人机互动中的健康、环境与风险议题。这些问题体现了我国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在本土化过程中,问题意识与理论创新的紧密结合。

简而言之,优秀的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需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关怀,既掌握理论与方法,又具备社会洞察力,以回应现实需求。值得强调的是,本土化研究的价值不应仅限于本土,而在于能否提出具有全球适用性的理论。从这一角度看,我们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本土化,而是希望中国学者能构建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传播学界具有引领性的理论体系。

五、结语

本研究以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为例探讨了传播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机遇和所面临的挑战。笔者首先梳理并比较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的起源与发展。随后进一步分析传播学本土化的核心概念和意涵,并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出发,探讨在这些领域的本土化思考。最后,本文指出,健

康、环境与风险传播本土化要重视议题和方法,对于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以上研究的本土化应经历理论的验证、拓展和创新三个阶段。此外,本土化研究理论创新的核心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中国本土的问题,而是提出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适用的理论,以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传播学者应摒弃中西方二元对立思想,通过发掘中国自身在全球性问题中的普适性和贡献点,积极搭建与世界学术话语体系的连接。归根结底,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研究的本土化绝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应该既能够促进学术理论创新,也能够回应重大现实问题,应该既能被本民族欣赏,也能被西方学界认可,它既是本土推崇的,更是为世界所瞩目的。

参考文献:

- [1] 谢宇. 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 社会学研究, 2018, 2: 1-13+242.
- [2] 贺雪峰. 本土化与主体性: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兼与谢宇教授商榷. 探索与争鸣, 2020, 1: 83-89+158-159.
- [3] 郭震旦. 音调难定的本土化——近年来若干相关问题述评.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1: 1-18+194.
- [4] 刘海龙. 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1, 9: 43-48.
- [5] 胡翼青. 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 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1, 4: 34-39.
- [6] 李智. 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对中国传播研究二元路径的再思考. 国际新闻界, 2011, 9: 33-39.
- [7] 邹利斌, 孙江波. 在“本土化”与“自主性”之间——从“传播研究本土化”到“传播理论的本土贡献”的若干思考. 国际新闻界, 2011, 12: 60-66.
- [8] 祝建华. 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 20 年受众研究心得谈.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1, 4: 68-73+96.
- [9] 史安斌. 危机传播研究的“西方范式”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 国际新闻界, 2008, 6: 22-27.
- [10] 王怡红. 对话: 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 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1995, 6: 10-13.
- [11] B. Korsch, V. F. Negret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1972, 227(2): 66-75.
- [12] S. P. Hays. Beauty, Health, and Permanenc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2.
- [13] K. R. Stamm. Environment and Communication//F. G. Kline, P. J. Tichenor.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 1972: 265-294.
- [14] K. A. McComas. Defining Moments in Risk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6-2005.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06, 11(1): 75-91.
- [15]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US) Committee on 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Improving Risk Communication. US: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989.
- [16] H. Zoller, M. J. Dutta. Emerging Perspectives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28.
- [17] 陈梁. 健康传播: 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0: 3, 162.
- [18] R. Guillierie, A. C. Schoenfel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ommentary: 1969-1979. Ohio: Information Reference Center(ERIC/IRC) of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79: 52.
- [19] J. N. Kim, S. C. Park, S. W. Yoo, et al. Mapping Health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Breadth, Depth, and Agenda of Published Research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0, 25(6-7): 487-503.
- [20] S. Agin, M. Karlsson. Mapping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1993-2018: Geographically Biased, Theoretically Narrow, and Methodologically Limited.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21, 15(4): 431-446.
- [21] M. Siegrist, J. Árvai. Risk Perception: Reflections on 40 Years of Research. Risk Analysis, 2020, 40(1): 2191-2206.
- [22] N. Boase, M. White, W. Gaze, et al. Evaluating the Mental Models Approach to Developing a Risk Communication: A Scoping Review of the Evidence. Risk Analysis, 2017, 37(11): 2132-2149.
- [23] R. E. Kasperson, O. Renn, P. Slovic, et al.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1988, 8(2): 177-187.

- [24] K. Lachlan, P. R. Spence. Communicating Risks: Examining Hazard and Outrage in Multiple Contexts. *Risk Analysis*, 2010, 30(12): 1872-1886.
- [25] M. G. Morgan, B. Fischhoff, A. Bostrom, et al. *Risk Communication: A Mental Mode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51.
- [26] 邵培仁.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9, 4: 36-41.
- [27] 贾鹤鹏, 张志安. 新闻传播研究的国际发表与中国问题——基于 SSCI 数据库的研究. *新闻大学*, 2015, 3: 10-16.
- [28] J. Shi. Development of a Multidimensional Attitude Scale for Organ Donation Research: An Example from China.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9, 34(6): 598-606.
- [29] N. Zhang, D. Li. Mind the Gap: How Zhongyong Thinking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 Use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s in China.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23, 17(4): 437-451.
- [30] A. Ngien, S. Jiang. The Effect of Social Media on Stress among Young Adult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Taking into Account Fatalism and Social Media Exhaus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 2022, 37(10): 1337-1344.
- [31] A. Chib, T. K. Phuong, C. W. Si, et al. Enabling Informal Digital Guanxi for Rural Doctors in Shaanxi,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6(1): 62-80.
- [32] Z. An, C. P. Chou. Social Support for First-time Chinese Mothers in Contexts of Provider-recipient Relationships.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6, 31(4): 504-512.
- [33] H. Jia, X. Luo. I Wear a Mask for My Country: Conspiracy Theories, Nationalism, and Intention to Adopt COVID-19 Prevention Behaviors at the Later Stage of Pandemic Control in China. *Health Communication*, 2023, 38(3): 543-551.
- [34] S. Jia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to-Face and Online Patient-provider Communication: Examining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Patient Trust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 2020, 35(3): 341-349.
- [35] L. Chen, H. Tang, Y. Guo. Effect of Patient-centered Communication on Physician-patient Conflicts from the Physicians' Perspective: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22, 27(3): 164-172.
- [36] Z. Zhong, J. Nie, X. Xie, et al. How Medic-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Influence Chinese Patients' Treatment Adherenc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9, 24(1): 29-37.
- [37] M. Sun, X. Ma, L. Jiang, et al. Framing Waste Classification among Chinese Young Peopl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21, 15(8): 1008-1024.
- [38] J. Shi, L. Chen. Social Support on Weibo for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in China: A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4, 7(3): 285-298.
- [39] X. Yang, L. Chen, Q. Feng. Risk Perception of Food Safety Issue on Social Medi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 9(2): 124-138.
- [40] K. Witte. Putting the Fear Back into Fear Appeals: The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992, 59(4): 329-349.
- [41] M. Chen, L. Chen. Promoting Smoking Cessation in China: Using an Expansion of the EPPM with Other-oriented Threat.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21, 26(3): 174-183.
- [42] L. Chen, X. Yang. Using EPPM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Fear Appeal Messages Across Different Media Outlets to Increase the Intention of Breast Self-examination Among Chinese Women.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9, 34(11): 1-8.
- [43] M. E. McCombs, D. L. 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2, 36(2): 176-187.
- [44] 赵蕾. 议程设置 50 年: 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与转向——议程设置奠基人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唐纳德·肖与大卫·韦弗教授访谈. *国际新闻界*, 2019, 1: 66-80.
- [45] X. Wang, L. Chen, J. Shi, et al. Who Sets the Agenda? The Dynamic Agenda Setting of the Wildlife Issue on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23, 17(3): 245-262.
- [46] R. J. Griffin, S. Dunwoody, K. Neuwirth. Proposed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of 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eventive Behavior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1999, 80(2): S230-S245.
- [47] Z. J. Yang, L. Kahlor, H. Li. A United States-China Comparison of Risk Information-seeking Inten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4, 41(7): 935-960.
- [48] 苗伟山, 贾鹤鹏, 张志安. 为何缺乏本土化关照? ——新闻传播领域国际发表中的问题反思. *新闻大学*, 2018, 4:

72-77+153.

- [49] 人民网. 落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2023-10-27. [2024-12-26] <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23/1027/c1002-40105034.html>.
- [50] R. Zeng, Y. Chen, H. Li.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 Unfair Experience, Interests Involved, and Political Efficacy.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8, 46(9): 1561-1572.

Rethink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Localization of Health, Environmental and Risk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Chen Liang, Tang Hongjie (Tsinghua University)

Liu Sij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bstract: At present, build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is particularly urgent. With the growing prominence of global issues related to health, the environment, and risk, domestic communication scholars have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and conducted research in these areas. In China, due to the global nature of these issues and the fact that many related scholars have overseas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these field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mong the most internationalized area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y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ealth, environmental, and risk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localization”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core of localizing such research in China lies in grounding it in the national 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 paying attention to both the universal and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issues, and adopting integr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Finally, engaging in active dialogue and exchang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through the three stages of theoretical validation, extension, and innovation. Importantly, the localization of health, environmental, and risk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not merely aimed at serving China’s academic discourse and practical problem-solving. Rather, it seeks to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global challenges in health, environmental, and risk issues by proposing theoretically leading and cross-culturally relevant frameworks. Localization is not just a path of knowledge production—it is also a crucial opportunity for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 establish itself. Experience from research in these areas suggests that only by rooting scholarship in China’s cultural context, social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can scholars develop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a conceptual system with subjectivity, thereby truly participating at the core of global theoretical dialogue.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isk communication; localizatio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 收稿日期: 2024-12-26

■ 作者单位: 陈 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4

汤鸿杰(通讯作者),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

刘斯佳, 美国西北大学传播学院; 美国伊利诺伊州 60208

■ 责任编辑: 刘金波